

社会救助能否拉动内需？

（虞义华、郑新业）

摘要

步入21世纪，世界目睹了中国经济年平均9%的快速增长，这种快速增长对我国及全世界都带来了显著的影响。然而这种增长是靠大量的民间投资和政府支出来拉动的，很少人认为这种增长的步伐是可持续的。我国可持续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弱化投资及政府支出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使得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我们需把注意力转移到消费需求上来。

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如何提高我国的消费水平？在这些因素当中，社会救助对消费起有没有作用？如果有，作用有多大？细分社会救助的几大支出类，低保支出及福利支出等对消费又起到了什么作用，作用有何不同？本文对这些问题在作了一一回答。利用2005年地级市的数据，我们实证分析了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我们发现社会保障补助及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的提高都能带动消费的提高，而后者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最大，而且这些拉动效应比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还要强。我们还发现城镇生活最低保障支出对消费没有拉动作用，总的看来，社会保障支出对消费确实有拉动作用。这些发现对我国要实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表现在：我国经济要保持快速、可持续的增长，传统的靠提高生产要素数量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特别是在我国面临出口受阻以及政府有意抑制投资过热的压力下，使得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必要的，而增长模式的改变是需要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来支撑的。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被认为在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保证社会安定方面其重要作用，本文的实证发现社会救助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它能起到拉动消费，促进经济的作用。这个结果影射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对于我国社会救助出现的许多问题（资金投入不足、救助标准过低等），政府势必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制度。这不仅关系到民生大事，也关乎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步入21世纪，世界目睹了中国经济年平均9%的快速增长，这种快速增长对我国及全世界都带来了显著的影响。然而这种增长是靠大量的民间投资和政府支出来拉动的，很少人认为这种增长的步伐是可持续的。我国可持续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弱化投资及政府支出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要使得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我们需把注意力转移到消费需求上来。作为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之一，消费是一国经济循环的先导性因素，更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同消费占GDP比重60%的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始终徘徊在37%左右。上升的空间仍然很大。中国消费的不足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在保证经济的9%的稳步增长的前提下，我国面临出口受阻以及政府有意抑制投资过热的现状使得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成为必要和必然。

现在要提的问题是，如何提高我国的消费水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回归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在这些因素当中，社会救助对消费起到了什么作用？作用有多大？细分社会救助的几大支出类，低保支出及福利支出等对消费又起到了什么作用，作用有何不同？本文对这些问题在作了一一回答。利用2005年地级市的数据，我们的实证分析了社会救助对消费的影响。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我们简要分析了我国的居民消费现状，第三部分分析了我国社会救助的现状，简要概括了欧美及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救助的内容、特点以及社会救助对消费的影响方面的相关文献。第四部分，我们建立影响消费的实证模型。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最后一部分简要讨论本文的主要发现及政策含义。

二、我国居民消费现状

2.1 居民消费率呈下降趋势

由表 1 可见，我国消费总额尽管呈现出逐年递增趋势，但居民消费总额占 GDP 的比重始终徘徊在 37%左右，这与欧美国家消费需求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60%形成鲜明反差。¹从历史的角度也可以看出我国消费率处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比如说，我国的消费率比美国在 1850 年的消费率还要低，当时美国的人均 GDP 跟现在的中国差不多（McKinsey, 2009）。

长期以来，我国消费率偏低。中国经济想转型，在投资受压缩，净出口受限制的情况下，怎样提高我国的目前的 37%的消费水平？提高消费的工具（动机）是什么？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来给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可能的答案和思路。

表1 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2004-2009）

	国内生产 总值（亿元）	居民消费 支出（亿元）	消费占 GDP 比重（%）
2004	159878.3	63833.5	39.9
2005	183217.4	71217.5	38.9
2006	216314.4	82103.5	38
2007	265810.3	95609.8	36
2008	314045.4	110594.5	35.2
2009	340506.8	121129.9	35.6

注：2004-2005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和居民消费支出数据分别来自《2006中国统计年鉴》表2-1和2-19。2006-2009年对应数据来自《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表2-1和2-19。

¹ <http://www.eea.europa.eu/data-and-maps/figures/household-and-public-sector-consumption-as-a-percentage-of-gdp/#>.

2.2 居民消费地区差异大

从图 1 可知我国人均居民消费高的几个省分别为：新疆、广东、浙江、辽宁、海南、福建、江苏、山东和吉林。并且从饼状图可以消费总额占全国消费总额比例较高的几个省分别为：广东（9.64%）、山东（9.69%）、江苏（8.97%）、浙江（7.96）、河南（6.16）和辽宁（5.70%）。这六个省份的消费总额已经超过了全国消费的 50%。总的说来，我国的人均消费额或总额都集中在少数的几个省份，这些省份主要位于沿海地区（如广东和江苏），或属于工业大省（如山东和辽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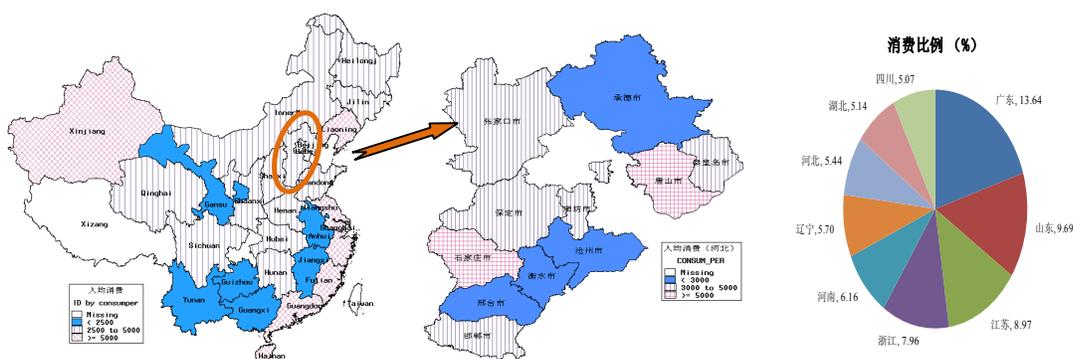


图 1. 2005 年中国人均消费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作者的计算。

2.3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所提高

从表 2 统计数字来看，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波动不大，但总的说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从 2009 年数据来看，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高，这可能是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在世界经济不景气前提下，中国出口乏力，出口成为逆差（表现在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为-40.6%），中央政府把扩大内需

作为 2009 年经济工作重点，期间出炉了多项优惠政策着重启动汽车、家电、房地产等等消费热点，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促进了 2009 年的消费增长。

表2 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4-2009）

	最终消费支出	资本形成总额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2004	39.5	54.5	6.0
2005	37.9	39.0	23.1
2006	40.0	43.9	16.1
2007	39.2	42.7	18.1
2008	43.5	47.5	9.0
2009	45.4	95.2	-40.6

注：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表 2-20。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加上政府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加上存货增加。贡献率指三大需求增量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

三、我国社会救助现状及国际比较

社会救助是包括社会救济在内的多种扶危助困措施, 不仅包括对贫困人口衣食的救济, 还包括对其医疗、教育、住房等的救助。²社会救助不仅有助于消除贫困, 而且有助于增加人力资本, 提高劳动生产率, 最终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 世界各国对社会救助项目投入大量资源。以 OECD 国家为例, 平均来说, 3.1%的 GDP 是用于社会救助的 (World Bank, 2006)。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也类似, 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洪都拉斯等国家花费了从 0.5%到 2.5%不等的 GDP 进行社会救助 (Lindert et al., 2006)。

² 具体点讲, 社会救助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灾害救助、农村特困户生活救助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住房救助制度、司法救助制度等方面。

3.1 欧美国家的社会救助

美国的社会救助制度,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当时罗斯福总统颁布了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后经历多次修改和补充,逐步形成了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美国称之为公共福利系统或“社会安全网”。社会救助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社会救助制度设计考虑到了贫困群体的种种需要,覆盖面比较广。救助项目包括了医疗保险、收入保障、食品救助、住房补助、学习工作等近百项(表 4)。表 4 显示,美国在 2000 年花费了大概 4370 亿美元在这些社会救助项目上,占到了美国当年 GDP 的 4.4%。其中联邦政府承担了约 70%的开销,剩余的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在这些福利支出中,有一半为医疗保险支出,20%为现金支付,食品救助和住房补贴项目各占 8%。相比于广泛的社会救助方式的美国,其它欧美国家(如挪威、荷兰、新西兰)的救助形式则是多采取现金救助方式。这些国家的社会救助的资金来源也与美国存在较大差异。在美国,社会救助项目资金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承担(表 4),在丹麦,用于保障最低收入的救助开支一半由国家承担,在荷兰,国家负责 90%,而英国、卢森堡和爱尔兰则承担 100%的支出责任(郭明霞,2010)。

表 3 美国各级政府社会救助项目支出范围及额度, 2000

	项目数	联邦(\$10亿)	州、地方(\$10亿)	总额(\$10亿)	% of Total
医疗保险(Medical Care)	9	131.5	94.4	225.9	52%
现金救助(Cash Transfers)	11	72.5	19.2	91.7	21%
食品救助(Food-Based Transfers)	11	32.2	2.2	34.3	8%
住房补助(Housing Assistance)	16	29.3	5.6	34.9	8%
教育援助(Education Aid)	14	19	1.3	20.4	5%
服务(Services)	9	14.2	6.5	20.7	5%
工作/培训(Jobs/training)	12	6.2	1.1	7.4	2%
能源援助(Energy Aid)	2	1.6	0.1	1.7	0%
总共	84	306.5	130.5	437	100%

来源: Lindert (2005)

3.2 拉美国家的社会救助

90年代中后期，拉美各国出台了一系列社会救助项目（计划），如墨西哥的机会项目（Oportunidades）、巴西的家庭支持计划（Bolsa Familia）、洪都拉斯的家庭拨款计划（PRAF）、尼加拉瓜的社会保护网络项目（Red de Protección）等。这些新型计划的目的在于把救助资格与个人就业、教育培训和医疗服务等人力资本发展政策结合在一起，以提高穷人的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并激励其进入劳动力市场，以期达到长期内消除贫困的目标（张浩淼，2010）。

实证分析表明，拉美国家实施的这些计划确实对家庭的消费等因素有积极影响。Maluccio(2004)的研究表明这些计划对增加了居民的支出及居民在食物方面的消费（表4），其中尼加拉瓜的社会保护网路项目对消费的影响最大。在最近的一篇文章分析中，Fiszbein et al. (2009)分析了拉美国家的这些救助计划对消费、贫困、教育及营养状况的影响。他们得到了类似的发现。他们发现了尼加拉瓜的社会保护网路项目对人均消费的中位值的影响最大（表5）。

表4 拉美国国家社会救助项目对居民支出及食物消费的影响

项目	项目经费 (亿美元)	受益人 (万)	每年平均转 移额 (美元)	占居民支 出的比例 (%)	居民总支 出变化 (%)	居民食物 消费变化 (%)
Bolsa Alimentacao (巴西的家庭支持计划)	1.25	170	150	8	7	14
PROGESA/Oportunidades (墨西哥的机会项目)	10	36.2	500	20	13	11
Programa de Asignación Familiar (洪都拉斯的家庭拨款计划)	0.2	260	110	4	5	5
Red de Protección (尼加拉瓜的社会保护网络项目)	0.04	1	300	18	13	17

注：根据 Maluccio (2004)整理; 巴西的 Bolsa Alimentacao 项目已经跟 Bolsa Escola 项目合并成现在的 Bolsa Familia。

表 5 拉美国家社会救助项目对消费的影响

	巴西		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		洪都拉斯		墨西哥			尼加拉瓜	
	2002	2002	2006	2003	2005	2000	2002	1998	1999/6	1999/10	2000	2001	2002
对照组家庭日人均消费中位数（当年美元）	0.83	0.85	1.19	1.12	1.13	0.79	0.68	0.59	0.58	0.59	0.63	0.53	0.52
日人均转移支付金额（当年美元）	0.06	0.12	0.13	0.08	0.08	0.06	0.06	0.12	0.14	0.13	0.16	0.15	0.15
转移支付占消费比例(%)	8	17	13	8	7	9	11	21	20	19	29	31	30
对人均消费中位值的影响(%)	7.0**	A	10.0**	A	B	A	7.0*	B	7.8**	8.3**	A	29.3**	20.6**

注：根据 Fiszbein et al. (2009)整理。1) A 表示基线，各项目的受益家庭接受转移金额前的情况；2) B 表示对消费没有显著影响；3) *表示在 10%水平上显著；4) **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

3.3 我国的社会救助

3.3.1 救助现状

目前我国存在的社会救助项目主要包括救灾、救济、五保和扶贫 4 个方面。在建国初期，有于战争及自然灾害等情况，我国社会救助的主要特点是救急，在救助方式上以发放实物（粮食及衣物）为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重心放在了农村的贫困问题上，以“扶贫、脱贫”为宗旨。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对社会救济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包括救灾、救济、五保（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和扶贫 4 个方面。这些改革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其中大多数政策措施目前还在实施。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及财政实力的提高，我国的社会救助方式虽有所改变，但仍然以保障贫困

人口的最低生活需求为主,不能解决其他方面的（如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特殊生活困难。

3.3.2 国际比较

不同的国家，其社会救助的作用和地位都不相同。有的国家是以社会救助为主导的公共福利制度（如瑞典）；而有的国家则把社会救助作为一种补充形式，只对参与保险以外的人给予救助（如英国）。而中国社会救助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社会贫困和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侧重于对贫困人口的救济,对社会保险的补充作用不明显。

社会救助的重要性可以由社会救助的覆盖范围和开支规模来衡量（Gough et al., 1997）从覆盖范围看，我们可以用社会救助的受助者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来考察；从开支规模角度看，我们可以用社会救助支出占各国 GDP 的比例来考察。表 6 列示了我国同其他亚洲国家和欧美一些国家的社会救助和开支规模现状。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救助的覆盖面或是开支规模的角度来看，社会救助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表6 社会救助覆盖面及开支规模

	国家（年份）	受助人数/总人口(%)	救助经费/GDP (%)
	中国（2008）	4.0	0.15
亚洲	日本（2002）	1.0	0.5
	韩国（2001）	3.0	0.5
	美国（2000）	17.5	4.4
欧美	英国（1992）	15.3	6.4
	德国（1992）	6.8	1.6

注：来源于张浩淼（2011）、Lindert(2005)。

同美国、英国比较齐全的社会救助项目相比，我国现行的社会救助项目比较单一，主要还是生活救助。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及财政实力的提高，我国的社会救助方式虽有所改变，但仍然以保障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需求为主，不能解决其他方面的（如教育救助、住房救助等）特殊生活困难。

四、模型与数据

我们设定经验模型如下：

$$CONSUM_i = \alpha + \beta ASSIST_i + \gamma ASSIST_WAGE_i + \theta WAGE_i + \delta Z_i + \varepsilon_i$$

$CONSUM_i$ 为城市 i 的消费率，我们用城市 i 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除以该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用来代理居民的消费支出。³在实证分析时，我们尝试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 $ASSIST_i$ 为城市 i 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在实证分析中，我们进一步尝试用城镇人均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MINSECUR$) 及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 ($PENSION$) 来分析这两类‘民生’变量对消费(率)的影响。本文所涉及到的所有变量来源及统计性描述见表 4。 $WAGE$ 为职工的平均工资。消费理论告诉我们在决定消费支出的众多因素之中，收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用于消费的数额也会相应增加。具体来讲，增加一块钱引发的消费被称作边际消费倾向，消费理论认为边际消费倾向位于 0-1 之间，即消费的增长幅度小于收入的增长幅度。理论上较好的衡量居民收入水平的变量为可支配收入，由于我们找不到地级市层面的可支配收入变量，我们用 $WAGE$ 来作为反映居民收入水平的代理变量。我们预期这个系数的符号是

³居民消费指常住居民在一定时期内的全部消费性货物和服务支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指各行业企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包括服务性消费。居民消费支出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具有高度相关性但又有区别，因此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作为居民消费支出的代理变量会产生测度误差的问题。

正的，且在 0-1 之间。*ASSIST_W*为 *ASSIST*和 *WAGE*这两个变量的交叉项。加入这个交叉项的理由在于，我们认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对消费的影响可能会因为收入水平（*WAGE*）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收入水平，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对消费的边际效应可能是不一样的。类似的，对于其它两类民生支出模型，我们都加入对应的交叉项以反映这种可能性。*Z*为一系列影响消费的控制变量，它们是：

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对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新增人口的影响，二是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其中新增人口对增加消费的影响体现在新增人口的基本消费增加和这些新增人口因为生活质量改善所产生的消费增加这两个方面。因此我们在文中引用城市的人口出生率（*BIRTHRATE*）变量，我们预期这个变量的符号是正的。而人口结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镇人口相比于农村人口更高的消费量和年轻人相比于其它年龄群体人拥有更高的消费。由此我们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两个额外的人口变量(*URBAN*和 *AGE1564*)，其中 *URBAN*定义为城镇人口占城市总人口额比例，*AGE1564*为年龄在 15-64 岁之间的人口数占城市总人口数的比例。我们预期这两个变量对消费的影响是正的。

价格因素：通货膨胀影响居民的消费选择，使居民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为了准确刻度社会救助对消费的影响，我们必须控制地区的通货膨胀的消费效应。可以预见，增加一块钱的社会救助在通胀高的城市要比在通胀低的城市产生的消费拉动作用小。在模型中，我们加入城市的通货膨胀率（*INFLATION*）这一控制变量。我们预期该变量对消费支出产生负的影响。由于部分地级市 2005 年的通胀率数据缺失，我们采用其周边城市的通胀率作为替代。针对某些省（如云南省）下面的所有地级市数据缺失的情况，我们采用该省 2005 年的通胀率来作为这些地级市的通胀率。

表 7 社会救助（济）回归模型变量统计性描述（2005）

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CONSUM（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	278	4230.0	4560.9	276.6	55438.1
解释变量					
1. ASSIST（人均社会保障补助，元）	281	69.1	71.5	3.1	456.0
2. MINISECUR（人均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元）	280	17.0	15.4	0.7	114.9
3. PENSION（人均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元）	274	41.0	22.2	10.8	174.3
WAGE（职工平均工资，元）	276	13565.0	4096.4	6207.1	31928.1
BIRTHRATE（出生率，%）	276	11.3	2.9	5.7	24.0
URBAN（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276	39.3	17.9	8.2	100.0
AGE1564（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276	70.3	4.6	56.3	90.3
INFLATION（通胀率，%）	281	2.2	1.9	-3.5	7.5
RICHPOOR（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总税收，%）	281	10.4	4.6	3.0	33.8

数据来源：除 INFLATION 来自统计年鉴外，其它变量数据皆来自《2006 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

贫富因素：在解释地区消费差异的变量中，我们需要考虑不同收入群体对消费的差异。宏观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低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为此，我们建立一个变量 RICHPOOR, 其定义为个人所得税收加上企业所得税的总和除以总税收的百分比来反映贫富因素对消费的影响。我们预期 RICHPOOR 这个变量的符号为负。

区位因素：上述列举的影响消费支出的变量也许非常有限，因此有必要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一些区域虚拟变量来控制观测不到的区域异质性，因为城市的某些特有特征有可能没有被上述变量所体现到但却有可能会影响该城市的消费行为。因此，我们在回归式子中包括了三个区域虚拟变量（*COASTAL*、*CENTRAL* 和 *WESTERN*）。我国政府把经济地区分为沿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沿海地区覆盖 9 个省（其中包括 3 个直辖市）。这 9 个省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我国旧工业基地-东北部地区包括 3 个省 - 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省。中部地区包括 6 个省 - 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欠发达西部地区包括 9 省（含 3 个自治区） - 甘

肃、贵州、青海、陕西、四川、云南、广西、内蒙古和宁夏。因此，如果一个地级市位于沿海地区，我们给 *COASTAL* 变量取值为 1，否则取 0。本文所涉及到的所有变量来源及统计性描述如表 7。

五、实证结果

表 8 给出了 3 种人均消费决定因素模型。第一、二列报告了社会保障支出对消费的影响模型；第三、四列为城镇低保对消费的影响模型；第五、六列为社会福利救济模型。首先我们分析社会保障模型的结果，总的说来社会救助，连同其它的收入变量、人口变量、价格因素及区位因素等变量的变化能够解释 62% 的消费的变化。社会保障补助变量系数，收入系数及其交叉项都在 99% 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个结果表明，不同的收入水平下，社会保障支出对消费的边际影响是不同的。进一步我们可以得出，社会保障支出对消费的影响为 $dCONSUM/dASSIST = -53.844 + 0.004WAGE$ ，而职工工资对消费的影响为 $dCONSUM/dWAGE = 0.036 + 0.004ASSIST$ 。根据表 7 的变量的平均值，我们计得出社会救助对消费的偏导数为 0.416，而职工工资对消费的偏导数为 0.313。这个结果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社会救助增加 1 元钱，居民的人均消费增加 0.42 元，而职工的平均工资每增加 1 元钱拉动的人均消费为 0.31 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带来的消费效应比社会救助带来的消费效应要小一些。这个结果可能表明，同样增加一元钱，如果是由于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补助，而不是来自自己的就业单位，前者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拉动消费。对于其它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地区间的通货膨胀差异不能解释消费的差异。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城市化越高的城市消费越高，且年轻人（相比老

年人而言)比例越高的城市人均消费越高。相比中部地区而言,沿海地区的人均消费比中部地区高,西部及东北部地区比中部地区的消费低。

其次,我们分析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模型的实证结果。总的说来,我们发现政府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支出对消费的作用不明显。相比于社会保障模型,我们发现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年龄结构因素对消费有类似的影响,但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略大(约为 $0.072 + 0.023 \times 17 = 0.463$),且城市化率对消费的作用略大。同样,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及东北部地区比中部地区的人均消费低。

最后,社会福利救济模型结果表明,社会福利救济变量系数,收入系数及其交叉项在95%统计水平上显著。福利救济支出对消费的影响为 $dCONSUM/dPENSIION = -12.983 + 0.001 WAGE$,而职工工资对消费的影响为 $dCONSUM/dWAGE = 0.435 + 0.001 ASSIST$,进一步我们得出社会救助对消费的偏导数为0.582,而职工工资对消费的偏导数为0.476。这个结果表明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带来的消费效应比福利救济带来的消费效应要小一些。这个结果跟社会保障支出模型的结果是一致的。

对这三类民生变量做一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人均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最大,每增加一元的人均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带来约0.58元的消费支出,比社会保障支出模型中增加一元资助带来的消费效应高约0.16元,并且,这两个模型的结果都表明社会救助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大于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但总的说来,我们发现城镇最低保障生活保障支出对消费没有拉动作用。

表 8 社保、低保及社会福利救济模型 OLS 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人均消费）

	社会保障模型	城镇低保模型	福利救济模型
ASSIST	-53.844*** (3.90)		
ASSIST_WAGE	0.004*** (8.37)		
MINISECUR		-89.667 (1.37)	
MINISECUR_WAGE		0.023 (1.49)	
PENSION			-12.983*** (3.49)
PENSION_WAGE			0.001** (1.98)
WAGE	0.036*** (2.60)	0.072* (1.78)	0.435** (2.36)
BIRTHRATE	74.233 (0.49)	51.502 (0.62)	-40.493 (0.50)
URBAN	48.641** (2.71)	51.068*** (3.75)	20.284 (1.45)
AGE1564	432.947** (2.59)	346.950*** (5.21)	325.268*** (5.13)
INFLATION	-129.310 (0.98)	-130.198 (1.29)	-86.839 (0.90)
RICHPOOR	48.838 (0.84)	17.978 (0.44)	37.253 (0.97)
COASTAL	1,039.794 (1.08)	805.320 (1.46)	1034.862* (1.96)
NORTHEAST	-3298.577*** (3.06)	-2380.810*** (3.63)	-4216.313*** (6.39)
WESTERN	-1200.563** (2.13)	-1405.649*** (3.03)	-941.219** (2.12)
常数	-33419.843** (2.44)	-27625.860*** (5.76)	-25293.116*** (5.49)
观测值	270	270	268
R-squared	0.62	0.63	0.68

注：括号内为 t 绝对统计量；* (**、***) 表示在 10%（5%、1%）统计水平上显著。第三，五，七列括号内为用 cluster 方法调整过的 t 值。cluster 方法假定省际间观测值不相关，但省内观测值相关。

六、结论

利用 2005 年地级市的数据，我们实证分析了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我们发现社会保障补助及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的提高都能带动消费的提高，而后者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最大，而且这些拉动效应比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还要强。我们还发现城镇生活最低保障支出对消费没有拉动作用，总的看来，社会保障支出对消费确实有拉动作用。这些发现对我

国要实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表现在：我国经济要保持快速、可持续的增长，传统的靠提高生产要素数量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特别是在我国面临出口受阻以及政府有意抑制投资过热的压力下，使得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必要的，而增长模式的改变是需要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来支撑的。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被认为在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保证社会安定方面其重要作用，本文的实证发现社会救助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它能起到拉动消费，促进经济的作用。这个结果影射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对于我国社会救助出现的许多问题（资金投入不足、救助标准过低等），政府势必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制度。这不仅关系到民生大事，也关乎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模型系数的解释需谨慎。首先，本文用的2005年地级市的截面数据，它无法反映社会救助对消费影响的动态变化，也无法反映地区差异及经济周期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如果能利用面板数据(longitudinal/panel data)将是一种更好分析思路。其次，本文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为做处理，如消费的提升带来经济的繁荣意味着政府拥有更多的财力提供社会救助等民生支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通过模型得出的社会救助对消费的影响将会被高估。对于内生性的问题，我们需采用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的方法。潜在的工具变量可以是社会救助等内生变量的邻居值的加权平均值，这将属于空间计量分析的范畴。后续研究可以从这些方面进行展开。

文献

- Gough, L., Bradshaw, J., Ditch, J., Eardley, T., and Whiteford, P. (1997). Social assistance in OECD countries.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 **17**(1): 17- 43.
- Lindert, K. (2005) Implementing means-tested welfare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s 32762, The World Bank.

- Lindert, K., Skoufias E., and Shapiro, J. (2006) Redistributing income to the poor and the rich: public transfer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Discussion Paper. 0605. The World Bank.
- Maluccio, J. (2004). Effects of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s on current poverty, consumption, and nutrition. Second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onditional Transfer Programs, San Paulo, Brazil.
-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09) If you've Got it, Spend it: Unleashing the Chinese Consumer. MGI.
- Rawlings, L. A and Rubio, G. (2005)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s.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1): 29-55.
- 郭明霞 (2010) 社会救助的国际比较及其经验借鉴。《兰州大学学报》，第 3 期。
- 郑新业、张莉 (2009) 社会救助支付水平的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的证据。《管理世界》，第 2 期。
- 张浩淼 (2010) 拉美的新型社会救助与对中国的启示。《安徽行政学院学报》，第 2 期。
- 张浩淼 (2011) 重构亚洲国家的社会救助。《学习与实践》，第 1 期。